

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

汪兵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不仅要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实践进程来理解,还可以从中国近代文化传统和政治形态的交织境遇进行认知。从文化与政治的变奏视角考察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具有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主要体现于三重维度:政治现代化的维度主要表现在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发展暗合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文化现代化的维度主要是为五四运动之前的“文化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持续推动其深化;社会现代化的维度主要是在思想论争与实践的探索中,为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提供了理论准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五四时期进步社团衍生出“社会改造”探索的路径,为实现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提供了实践场域。

[关键词]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中国早期现代化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6.01.007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6)01-0055-07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所提炼的“标识性概念”。因此,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发生学意义,不仅要考察五四时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走向,而且要探析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内在逻辑。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转折阶段,中国近代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各种“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推动了早期现代化探索的进程。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但系统审视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研究成果还较少^[1]。因此,本文结合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拟从文化与政治变奏的视角进行考察。这一视角的选择,主要基于如下判断:新文化运动接触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是从文化这一范畴出发的,是从文化和政治的变奏里面衍生出的;进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问题是从文化和政治的历史脉络里面才能产生”^[2]。其中,“变奏”的意蕴主要是指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文化启蒙与政治救亡二者目标的相互交织、手段的彼此互渗以及地位的深刻转换。概括来说,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轨迹,发端于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的演进,激荡于对西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判,并致力于寻求对现代化取向和趋向的构建。

一、逻辑基础:近代中国视域下现代化进程中的社团组织创建

民国初建以后,国家政权逐渐落入北洋军阀手中。面对“中国向何处去”^[3]的时代之问,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引入西方“主义”的思潮,组织起来并创建团体、探寻出路。1915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深刻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也促进中国近代社团的创建逐步进入高潮阶段。

(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随之展开,“洋务运动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起步的标志”^[4]。西方各类“主义”思潮也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而逐步涌入中国。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尚未被进行理性批判,就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从学理层面看,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呈现出启蒙运动形态,兼具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双重属性,而近代中国兴起的启蒙运动,本质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理性主义内容。因此,思想启蒙就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渐渐向纵深推进。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晚清的士大夫们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萌生出向西方学

[投稿日期]2025-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3BDJ007)

[作者简介]汪兵(1980—),男,安徽六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习的想法。他们表现出对西方世界全面探索的热情,引领了中国思想界的新风气。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晚清地主阶级洋务派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大致构成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洋务运动不仅呈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和民族化活动的实践属性,更在二者的带动下孕育出民主化的思想萌芽。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士大夫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希望用政治变革的方法寻找国家的出路。这在戊戌变法期间的仁人志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戊戌变法没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但仍起到了一次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至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仅催生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更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热潮。这大致凸显了近代中国民族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运动发展的相互交织和并行发展样态。

到了民国初期,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尽管辛亥革命及其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可视为开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节点——这主要是基于其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和历史地位,但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辛亥革命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化基础只是初步的。1915年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又一次试图以“文化变革”为路径寻求救亡图存的积极探索和尝试。可以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肇始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起初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进而被迫吸纳部分西方先进文明而展开的,这使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一度呈现出防御性的特征,促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运动只能顺应世界潮流并结合自身实际,走出独特的发展路径。但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政治与文化的内在关联,甚至试图通过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来达到拯救国家命运的目的,“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5]。从根本上来说,不论是引入西方各类“主义”的思潮,还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内核改造,都是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而展开的。“从西学的介绍到西洋器物的引进,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除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外,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从没有停止过探索救国救民的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是对于用哪一种思想来指导和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6]

(二)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创建

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主观与客观、进步与落后、精神与物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外部挑战与内部反应等方面的互动中推进的。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过程中,西方“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新质因素。因此,从各种“主义”的思潮传播视角来看,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成了时尚。一时间,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汇集到了中国,空想的、科学的,有人物介绍,也有思想介绍,应有尽有。”^[7]“人总要有主义的”^[8]⁶⁶,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谈论“主义”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主义”还成为衡量思想进步的标志。

自清末废除科举、实行新学,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国内新式教育日渐兴盛起来,一些新式学校纷纷建立。到五四运动前后,近代中国已孕育出一批能够接受现代科学知识和具有民主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也被称为“边缘知识群体”,却“逐渐在边远地区集聚起了不小的舆论和行动能量,最后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9]²⁸。而基于“主义”传播形成的组织观念,则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关键环节”^[10]。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创建,实际上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及西方世界进程的认识密切相关。这个背景是理解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创建的重要基础。一般来看,狭义的社团,主要是由具有相同兴趣和爱好的群体组成的稳定组织,如恽代英发起的互助社;广义的社团,是指基于一定社会目的或利益目标、履行相关程序而创办的团体组织,如傅斯年和罗家伦创建的新潮社。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划分“社团”的定义,不仅可以清晰界定“社团”的含义,也可以把“社团”和集团、政团等其他组织区分开来。并且,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大多是借助进步社团及其创办的刊物来推动的。总之,结合五四时期“主义时代”境遇和社团概念的核心要素,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主要是指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寻求中国出路为核心诉求,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在时代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具有深远影响的进步组织。可以说,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是以推进新文化运动、践行“社会改造”为社团宗旨与共同目标,又通过一定的志趣和目标进行内在联结,最终构成了具有稳定关系的组织共同体。

二、理论认知: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维度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提供了多维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三个维度。当然,从文化与政治变奏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现代化的维度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手段;文化现代化的维度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背景;而包括经济现代化在内的社会现代化维度则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一) 政治现代化探索的维度

政治现代化的维度主要体现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动员。五四运动前后,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为这一政治动员的主体力量,然后“进一步发展,便是各种组织、团体的建立”^[11]。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强调“打倒孔家店”,还极力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二者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李大钊指出:“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12]429}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不仅关注人的个性张扬,还广泛吸纳西方新文化与思想学说,为政治现代化探索注入新的思想资源。

注重提倡人的个性张扬的新文化运动,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创建社团提供了机会。例如,互助社“意欲仿学青年会法,组织个人修养且为社会服务的团体”^[13]。1917年10月,恽代英、梁绍文和黄负生等主要发起人在武昌创办了互助社,其指导思想源于克鲁泡特金的进化论观点,大致基于三个因素:一是要“研究自助助人之善良方法而实行之”^{[14]122};二是要“借集思广益之功,收切磋琢磨之益”^{[14]122};三是要“借朝乾夕惕之法,求计日程功之效”^{[14]122}。因此,互助社注重团结进步青年,注重个人品行的修养并引导青年培养爱国主义。此外,受新村主义的影响,1919年12月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北京工读互助团在成立不到半年后,其中的各组陆续解散。

从本质上看,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不可避免地指向对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这进而会产生“一些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格局所无法容纳的新的社会群体,通过与现代西

方文明的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接触,其与传统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不断疏远”^{[15]215}。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无论是温和式的改良方式抑或暴力式的革命方式,都为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二) 文化现代化探索的维度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外在特征其实可以从文化内容上进行透视。李大钊认为,文化的盛衰关系“民族之兴亡”^{[12]443}。受《新青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十分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1917—1918年,为了配合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学生开始创立学习和研究的团体。”^[16]基于这样的情况,五四运动之前的进步社团倡导“文化变革”。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各派兼容、新旧并包”^{[17]23}的观点。除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外,蔡元培注重涵养青年学生的品行、丰富青年学生的业余生活、提升青年学生的研究兴趣以及培养青年学生的服务意识等,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创建的“各种社团有27个”^[18]。

隶属于北京大学的进步社团,就有新潮社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其中,新潮社的创办源于1917年秋,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发起,初衷是通过创办杂志来宣扬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及掀起学术研究的热潮。1920年8月15日,新潮社的社团刊物《新潮社》刊载的“纪事”,表明了该社团的性质:“本社虽然最初是个办杂志的团体,但我们都是智识上和志行上的结合,实在是一个学会的性质;况且丛书出版以后,当然见得我们不是专办杂志……我们对于新潮社更应当极力维持,做一种永久文化上的团体。”^{[14]62}此外,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于1919年3月底由邓中夏、廖书仓等学生所发起创办。有趣的是,这个进步社团的部分成员就来源于新潮社。而像新潮社的罗家伦、高君宇、康白情、朱自清,同时亦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重要成员。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从创建到深入发展,一直得到李大钊的倾心指导。他不仅指导社团在北京城里积极开展反封建的讲演活动,而且还鼓励社员们把宣传活动范围扩展到京郊地区。其他进步社团,如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在长沙成立。最初,该进步社团以“向上”和“互助”为核心特质,力图通过砥砺个人修养进而革新社会。1919年,新民学会为加强新文化宣传,还开展赴法勤工俭学的协调工作,积极发挥社团组织的文化效能。总体来看,新潮社主

要是运用学术研究的成果来传播新文化,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主要是通过举办讲演活动来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潮。新民学会在文化现代化方面的主要作为是“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组织戒律建立起了联系,从而又能使之超越地方历史意识和个人网络的局限,在更高的准则上确认自己的奋斗目标”^{[9]30}。虽然,进步社团对文化现代化的探索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批判性和超越性张力,但并没能填补惶惑状态下的价值危机和思想真空。不过,这却为掀起“文化变革”的运动作了重要铺垫。

(三) 社会现代化探索的维度

五四运动以后,时人围绕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发起了论争,而这种论争也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包括经济现代化在内的社会现代化的探索,因而可以从整体性视角阐述社会现代化探索的过程。

五四时期进步社团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当作新文化和新思潮来看待,但受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深刻影响,一部分进步社团最后明确地抛弃了其他“主义”派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19]改造社的主要发起人袁玉冰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对社团活动的指导地位和重要意义。袁玉冰指出,中国的现实情形使得没有时间来运用渐进的手段,否则“我们早已被军阀和外国资本家把皮剥完了,血吸尽了”^[20]。

近代新式知识分子否定了中国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没有否认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后主张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新潮社的发起人傅斯年就明确提出:“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8]64}同时,星期评论社的主要发起人施存统认为,要变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就要具备厚实的“物质条件”,“须先造成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的条件’”^[21]。二是先进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同时也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在经济现代化中起到的基础作用。“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学说,它告诉我们,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24]317}。“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24]320}。可以看出,进步社团已意识到经济现代化的任务应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三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主张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新社会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瞿秋白指出,社会主义“初则积累技术上的实用智识,继则综合分析,……综则组织而成科学”^[25]。据此,五四时期进步社团不仅主张要从经济现代化入手构建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图景,而且还通过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

就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实践路径来看,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三者关系密切,且共存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既体现了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核心主题的深刻把握,也呈现了“一个多层面的初具现代化取向的体系”^{[15]198}。这不仅是在思想文化上冲破封建传统的禁锢,为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奠定与之相适应的心理基础,而且还“形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思想先导,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15]215}。

三、实践理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路径

由于五四运动以后各类“主义”派别的传播及其论争,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因此,进步社团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研究中国情况,初步探索“社会改造”的实践理路。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深刻凸显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走向。

(一)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就初步组织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2年前后,《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连续刊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的译稿。该著作“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出现了三个不同汉译本,还以连载方式在杂志上发行,可见当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在极大程度上受限于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26]。随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日渐浓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各类译本大幅度增加,还出现了《共产党宣言》以及列宁著作的全译本或节译本。

为更好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进步社团充当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角色,明确阶级斗争为“社会改造”的核心路径,推动其他进步社团的认知从“泛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即“康米尼斯特研究会”)。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读书,举行报告会。会员专门学习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浅说》《工钱劳动和价值》及《向导》等书刊。研究会还参加社会活动,对一些政治事件,发表宣言”^[27]。此外,1920年10月,利群书社的发起人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过当时译文的题名为《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这是恽代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种“直译”^[28]方法。此外,1921年1月,恽代英还翻译了国内第一本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阶级斗争》。

进步社团开办文化书社被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诸如,长沙文化书社主要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创办的。这个进步书社销售的书刊很多,其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书刊常常成为销售的榜首。1920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主要目的在于既研究俄国劳农政府“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又可以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化”^{[14]67}。因此,长沙文化书社不仅传播新思潮和新文化,而且也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虽然,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但传播和研究的过程还存在诸多条件限制,加之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视野里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至于辩证唯物主义,几乎没有人触及”^[29]。不过,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二)探索“社会改造”方式和方法

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对“社会改造”进行思想探索,还尝试把“文化变革”逐渐转向“社会改造”的探索上。

1919年底,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必须承担着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活动的任务。他同时强调,“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30]507},他还表达出与现行旧式政党断绝关系的鲜明态度。这表明了《新青年》已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际探索并明确了发展方向,改变《新青年》之前“社员各人持论”^{[30]506}不能尽同的现象,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后明确转向“社会改造”的实践探索。陈独秀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新文化运动主题,即民主和科学,而且要求新文化运动的未来走向要关注“三件事”:一是“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二是“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三是“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31]。

陈独秀所说的这“三件事”,皆以“社会改造”为目标,表明了进步社团积极关注和研究社会生活的实践导向。这可以从五四时期进步社团的宗旨和目标中清晰窥见。比如,曙光杂志社明确把“社会改造”作为社团活动的目标和方向。它提出“另创一种新生活”和“一种新社会”的理想^{[32]49},主要是为了迎合“社会改造”的潮流和取向。在《曙光》第二卷第一期发布的《本志改良启事》中,明确承认了“前此本志言论,理想的多,现实的少”的缺点,决定“自二卷一号起,于卷首增添短评数篇……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本直觉之观察,为严重之批评”^{[32]52},标志着该进步刊物已转向并致力于关注“社会改造”的议题。此外,1920年,新民学会根据形势的发展,把社团的宗旨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14]5}。新民学会原来的宗旨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4]4},本身虽包含改造社会的思想,但主要侧重于储才蓄能、自我修养等方面。因此,该社团修改宗旨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将社团性质由过去的“学术团体”变革为“革命团体”,凸显新的发展趋向。虽然,新民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方针,符合“社会改造”探索方向,但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围绕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推进“社会改造”的探索,却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另外,利群书社的社团活动与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改造”探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该进步社团宣称:“我们将生活解决了再去宣传主义,才能够永久绵密的去图发展。”^{[14]168-169}但“主义”仍是该社团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有力指导。可见,“主义”的指导对进步社团推进“社会改造”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利群书社的主要发起人恽代英不仅重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而且还从理论层面阐明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改造”探索的必要性。恽代英甚至还将社会活动场域比喻

为“工厂”,将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喻为“工厂管理法”^[33]。

随着“社会改造”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进步社团改造社会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且表现得更为强烈,衍生出激进化的“社会改造”探索取向。少年中国学会在创建之初,不仅重视“社会改造”的探索,同时也提醒该社团的会员持续关注“个人解放”问题。该进步社团通过剖析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不仅揭露了各类社会问题,还阐述了相应的解决途径。不过,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非仅局限于解决个别问题,更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整体性根本性变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改造”的有效推进。

四、结语

从文化与政治变奏的整体视角来看,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初步探索,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助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更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初步转变。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双重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而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变革”升华到推进“社会改造”探索的新高度。这正如学界所指出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现实抉择,也在总结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达到了更切合实际、更深刻的水平。”^[34]由此可见,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救亡与启蒙,呈现出相互支撑、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不过,中国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急于求成”的心理。具体到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过程,其不足也较为明显: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未能充分落地,探索范围局限于城市和知识界;对传统的激烈批评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文化秩序的“断裂”等。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是承前启后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35]由此可见,考察五四时期进步社团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及其时代意蕴,不仅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提供历史发生学的思想资源理路,更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推进中国以及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36]。

参考文献

[1] 陈金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进展与理论深化:基于 CSS-

CI 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1): 14-28.

- [2] 汪晖. 汪晖对话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140.
- [3] 裴植, 陈思羽. 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觉轨迹[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2025(2): 43-54.
- [4] 罗平汉.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 2.
- [5]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96.
- [6] 建红英, 刘松涛, 薛小平.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41.
- [7] 杨慧清. 五四时期的抉择[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6.
- [8] 欧阳哲生.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傅斯年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9] 杨念群.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0] 王鸿. 重建意义之网:清末民初的观念革命与思想变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208.
- [11] 胡福明.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4: 138.
- [1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13] 李培艳. 青年恽代英的修身与小团体实践研究[J]. 湖湘论坛, 2018, 31(6): 77-85.
- [14] 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 [15] 陈勤, 李刚, 齐佩芳. 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卷)[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16]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 陈永明, 张静, 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197.
- [17] 许德珩. 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23.
- [18] 金林祥. 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4: 121.
- [19] 王毅. 主义、组织与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特质[J]. 历史研究, 2022(4): 83-103.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31.
- [2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398.
- [22] 尹婷婷.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71-76.
- [23]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03.

-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5]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89.
- [26] 方红.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传播[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38.
- [27]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2.
- [28] 恽代英. 恽代英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0.
- [29] 张静如.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29.
- [30]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1] 陈独秀. 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 [32] 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等.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33] 恽代英. 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0-221.
- [34] 何晓明. 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259.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1.
- [36] 王先俊. 世界现代化历史图景中的中国式现代化[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3(3):1-8.
- [责任编辑 金 钊]

Cultural and Political Variations: Exploration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by Progressive Societi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ANG B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quires not only understanding it based on the CPC's leadership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reform, and rejuvenation, but also recognizing it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context of China's moder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political forms. In this sense, it i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examine the explorations of early modernization by progressive societi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se exploration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was evident in how these societies' development aligned with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ced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continued to drive its deepening; and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was reflected in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for socialism to become China's historical choice through ideolog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progressive societi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developed the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practical field for achiev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Period; progressive societies;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